

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的雇佣问题探析

——兼与陷蕃之前及归义军统治时期雇佣比较

何志文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雇佣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吐蕃统治时期的经济状况。本文对雇佣契约的年代重新进行了推定;通过对雇契具体内涵的探讨,分析出雇佣的具体性质,归纳出雇佣关系的五种类型;将吐蕃与唐前期、归义军统治时期的雇佣进行对比,可知唐、五代雇契形式发展具有连续性,并渐趋完整与固定化;研究证明,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具有明显的时代与民族特色。

【关键字】吐蕃统治时期;雇佣;断代;性质;比较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5-0067-11

Analysis on Employment in Dunhuang during the Tibetan Occupation Period

——Compared with Employment in the Reign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eturn-to-Allegiance Army Period

HE Zhi-we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e Tibetan Occupation Period of Dunhuang served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Through the study of Employment in this period,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Tibetan Occupation Period from one side. First, re-dated to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Inquire into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to analysis the Specific properties of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And summed up the five types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eturn-to-Allegiance Army Period, the Tibetan Occupation Period has it's one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the form of Employment Contract wa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fixed from Tang to the five dynasties.

Keyword: Tibetan Occupation Period; employment; chronology division; nature; compare

雇者,谓出钱请人替自己做事,《汉书·平帝纪》中有“雇山钱月三百”的记载,如淳注“听使入钱雇功直,故谓之雇山”,应劭注“使女徒出钱雇薪,故曰雇山也”^①。佣者,指人出卖劳动力以获得报酬,《史记·陈涉世家》载“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广雅》云“佣,役也”,唐司马贞《索隐》“谓役力而受雇直也”^②。雇佣涉及人身租赁、依附关系、剥削方式等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

[收稿日期] 2017-04-27

[作者简介] 何志文(1990—),女,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唐代社会经济史、敦煌学研究。

① 班固:《汉书》卷12《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352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48《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9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与公布,学界对唐代,尤其是唐前期王朝统治时期(618-786)和唐末、五代归义军统治时期(786-1036)的雇佣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①。但是,介于两个时期中间的吐蕃统治时期(786-848)却鲜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或者说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时期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流传后世的汉文文献记载相对较少;再者,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古藏文(吐蕃文)文献多存于英、法、俄等国,公布与翻译相对滞后。

然而,吐蕃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吐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占领西域地区后,实行的统治实际上明显地呈现出本民族的特色。通过对这一时期雇佣问题的研究,并将其中原王朝统治时期、归义军统治时期的雇佣进行对比,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政权在政治与经济统治上存在的异同。而且,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发展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目前,只见侯文昌利用一件古藏文雇工契约,即 P.1297/4《收割青稞雇工契约》对这一时期雇佣契约的程式及其内容进行了探讨^②。但是,仅凭一件契约无法充分地说明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问题。近期,随着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翻译出版,使人们得以见到除 P.1297/4 之外的 5 件古藏文雇佣契约^③,这也为进一步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问题提供了契机。此外,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中有 3 件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雇佣契约^④;沙知录校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可补 2 件这一时期汉文雇佣契约^⑤。

笔者拟结合这十余件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契约,对这一时期雇契的断代与类型、雇工的理由与期限、雇者与佣者的身份、雇价与支付方式、权力与义务的规定、违约与赔偿条款、雇佣的性质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探讨。并且,通过与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对这一时期具有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考察。

一、雇契的断代与类型

敦煌出土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契约,兼有汉文和古藏文两种书写方式。这一时期的雇佣契约与唐王朝和归义军统治时期的雇佣契约相比,最明显地不同就是纪年方式。在唐王朝和归义军统治时期,一般采用年号纪年或干支纪年,相对而言文书的年代较为明确。但是,吐蕃统治时期,汉文雇佣契约采用的是地支纪年,古藏文雇佣契约采用的是十二生肖纪年。两者都为契约文书的年代断定带来一定难度。前人对这批雇佣契约的年代也只是做了大致的范围推定,并没有进行明确的断代。据陈国灿先生的研究,这两种文字契并不是随意并行,而是有时间上的先后区别,认为“在公元 832 年吐蕃统治当局有过立契须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此后都是吐蕃文契”^⑥。陈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探讨吐蕃统治时期雇

① 学界通过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对这两个时期的雇契性质、类型,雇佣劳动范围,佣作者的身份,雇主经济地位,工资给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乜小红在《中国中古契约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3 年)第八章《对中古一般雇佣契券关系的研究》开篇对学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此外,徐秀玲《中古时期雇佣契约研究——以敦煌吐鲁番出土雇佣文书为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也值得参考。

② 侯文昌:《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 年)第一章《雇佣契约》。

③ [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四章《雇佣契约》,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89-101 页;古藏文契约的转写本及注释见同书第 288-309 页。

④ 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432-434 页。

⑤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242-244 页。

⑥ 陈国灿:《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西域研究》2016 年第 4 期。

佣契约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首先,对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雇佣契约的断代进行分析。张传玺和沙知分别对收录的汉文雇佣契约进行了年代的推定。为便于探讨,现将这 5 件汉文雇佣契约前人推定的年代梳理汇总如表 1。

表 1	吐蕃统治时期汉文雇佣契约年代推定表		
文书名称	文书书写年代	前人推定年代	文书图版出处、编号
吐蕃卯年敦煌张和子预借工钱帖	卯年四月一日	811? (张传玺)	《敦煌宝藏》第 52 册第 350 页, S.6829 号背。
吐蕃寅年敦煌瓦匠汜英振受雇契	寅年八月七日	822? (张传玺、沙知)	北京图书馆藏, 北图咸字 59 号背; 又见《敦煌资料》第一辑第 335 页。
吐蕃巳年敦煌令狐善奴便刘价契	巳年二月十日	837? (张传玺)	《敦煌宝藏》第 125 册第 465 页, P.2964 号背; 又见《敦煌资料》第一辑第 382-383 页。
年代不详悉宁宗部落百姓贺胡子预取刘价契	□□□月十日	年代不详(沙知)	《敦煌宝藏》第 44 册第 647 页, S.5998 号。
年代不详悉宁宗部落百姓王晟子预取刘价契	□□□□四日	年代不详(沙知)	《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10 册第 17 页, S.5998 号背。

根据陈先生的研究,上表中文书断代明显存有疑问的是 P.2964 号背《吐蕃巳年敦煌令狐善奴便刘价契》。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有 5 个巳年,即己巳年(789)、辛巳年(801)、癸巳年(813)、乙巳年(825)、丁巳年(837)。如果在 832 年吐蕃统治当局有过立契须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那么这件由汉文书写的契约年代就不是 837 年。不过,这件契约有两处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契约中没有出现吐蕃的部落制;二是契约使用的量制采用的是汉制。考虑到吐蕃在敦煌始建部落的时间是贞元六年(790)^①,且吐蕃的量制推行需要一定时间,由此推测这件契约的年代应为部落建置前的巳年,即己巳年(789)。

关于 S.6829 号背《吐蕃卯年敦煌张和子预借工钱帖》和北图咸字 59 号背《吐蕃寅年敦煌瓦匠汜英振受雇契》的年代,从两件文书都出现“悉董(东)萨部落”这一部落建制来看,两件文书的年代应该在 790-832 年之间。此外,据山口瑞凤研究,“悉董(东)萨部落”是 820 年吐蕃在沙州编创的两个汉人部落之一^②。由此推断 S.6829 号背文书的卯年并非是前人推断的辛卯年(811),而是 820-832 年之间的癸卯年(823);北图咸字 59 号背文书的年代则与前人推断的相同,即壬寅年(822)。另外,两件年代不详的契约,从文书中出现的“悉宁宗部落”也可以推断一个大致的年代。据杨铭研究,“悉宁宗部落”是 824 年以后吐蕃在敦煌新编的一个汉人部落^③,由此推测这两件文书的年代应在 824-832 年之间。

接下来,对武内绍人收录的 6 件吐蕃统治时期的古藏文雇佣契约文书的年代做一探讨。现据武内氏的翻译的文本,结合武内氏推断的年代进行探讨。为便于分析,将这 6 件古藏文雇佣契约的年代梳理见表 2。

按上述分析,这 6 件古藏文契约文书的年代应在 832-848 年之间,因此表中雇契断代明显有疑问的是 Hedin3《雇工契》与 SI P/135《雇奴契》。从契约中的出现的于阗地名“质逻(ji-la)”与于阗“𑖦”字符标记可知,这 2 件契约的成书年代在吐蕃统治于阗时期(790-850)。武内氏将这 2 件契约的年代推定在吐蕃统治早期^④,这与陈先生所述的古藏文契约基本书写于 832 年以后的推断相矛盾。按陈先生研究,Hedin3《雇工契》应成书于 832-848 年之间的蛇年,即 837 年。在此期间有两个鼠年,即 832 和 844

① 相关研究参见[日]池田温:《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山本博士还历纪念 东洋史论丛》,1972 年;陈国灿:《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84 年第 1 期。
② [日]山口瑞凤:《沙州汉人による吐蕃二軍団の成立と mkhar tsan 軍団の位置》,《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设施研究纪要》第 4 号(1980)。
③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5 页。
④ 具体论证参见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 178-181 页。

表 2 吐蕃统治时期古藏文雇佣契约年代推定表

文书编号、名称	文书书写年代	武内氏推定年代	文书图版出处
P.1098 雇工送粮契	□年秋八月十七日	残缺(820?)	Choix2(pl.443)
P.1162 雇工契	牛年秋九月	833+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 11 册第 136 页。
Hedin3 雇工契	蛇年秋	801	贝利《塔克拉玛干》
P.1297/4 雇工收麦契	虎年	834+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 12 册第 057 页。
Or8212/194a 雇工契	狗年春	830+	伦敦大英图书馆
SI P/135 雇奴契	鼠年秋闰月十六日	796/808	彼德洛夫斯基收集品

说明:具体文本参见武内氏著《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 288-309 页。

年,考虑到史书中只有会昌四年(844)有闰月的相关记载^①,由此推测 SI P/135《雇奴契》的成书年代应为 844 年。此外,P.1098《雇工送粮契》年代也应该不是 820 年。

武内氏对其余 3 件古藏文雇佣契约的书写年代也进行了大致的推定。实际上,P.1297/4 出自永寿寺的一批文书中,而且据武内氏推定,永寿寺的存在可能局限于 810-840 年^②,由此推测 P.1297/4《雇工收麦契》的年代应该为 834 年。再者,考虑到 844 年以后已经接近吐蕃统治西域的末期,另外 2 件契约的成书年代也应在 832-843 这一轮十二生肖年之间。可以推定,P.1162《雇工契》的年代应为 833 年,Or8212/194a《雇工契》的年代为 842 年。

关于这 11 件雇佣契约的类型,武内氏从内容上将这一时期的古藏文契约部分划分为四类,即官差运输、军事服务、耕种和个人服务^③。徐秀玲在论文中按雇佣领域将敦煌吐鲁番地区的雇佣契约划分为农业、畜牧业、手工建筑业和雇人代役^④。实际上,按雇佣期限的长短,还可分为长期雇工契和短期雇工契。也小红根据雇佣的剥削量,将古代的雇佣契约分为奴役型、较平等型、相对或完全平等型^⑤。也氏的这一提法,值得引起关注。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契约,究竟属于何种性质?下节,将结合雇佣契约的具体内涵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雇佣关系与性质

上文提到雇佣的剥削量与类型问题,这也涉及到雇佣的性质问题。本节拟从雇工的理由与期限、雇者与佣者的身份、雇价与支付方式、权力与义务的规定、违约与赔偿条款等方面,对吐蕃统治时期雇佣契约中所见的雇佣关系做进一步地探讨。为便于分析,现按契约成书的时间顺序将这一时期雇佣契约的具体内容见表 3。

首先,对雇佣契约中出现的雇者身份进行分析。上表中雇者主要有两类身份:一是普通的百姓,即 P.1098 李玉贲(lig yu-legs)、P.1162 苏君君(so kun-kun)、Hedin3 李萨宗(libsar-gzhong)、Or8212/194a 汜尚参(bam shang-tsheng)、SI P/135 扎噶荣帕(za-ga khrom-pa);二是寺院僧人,即北图咸字 59 号背僧慈灯、S.6829 号背永康寺常住、P.1297/4 比丘张海净(cang he-dzeng)。

① 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48,唐武宗会昌四年闰月壬戌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 8003 年页。

② 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 159 页。

③ 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 89 页。

④ 徐秀玲:《中古时期雇佣契约研究——以敦煌吐鲁番出土雇佣文书为中心》,第 16 页。

⑤ 也小红:《中国中古契权关系研究》,第 234 页。

表 3

吐蕃统治时期雇佣契约的具体内容

文书名称	雇者与佣者	理由与期限	雇价与支付	权力与义务	违约与赔偿
P.2964 号背： 吐蕃已年敦煌 令狐善奴便刈 价契	雇者：缺 佣者：令狐善奴	理由：佣者为粮 用 期限：限至秋七 月内	雇价：麦壹硕陆 斗，刈麦壹拾亩 一次性支付	佣者依时收刈，不得违时限	1. 如依时吉报不 来，或欠收刈不 了，赔罚叁硕贰 斗 2. 如违，一任夺家 资杂物牛畜等， 用充麦直
北图咸字 59 号背：吐蕃寅 年敦煌瓦匠汜 英振受雇契	雇者：僧慈灯 佣者：悉东萨部 落百姓汜英振	理由：雇者造佛 堂，无博士 期限：八月十五 日起首	雇价：麦捌汉硕 分两次支付	佣者按期完工，并获得相应报 酬	如先悔者，罚麦 三驮
S.6829 号背： 吐蕃卯年敦煌 张和子预借工 钱帖	雇者：永康寺常 住 佣者：悉董萨部 落百姓张和子	理由：佣者为无 种子 期限：限四月廿 五日已前造了	雇价：麦壹蕃驮 一次性支付	佣者按期完工	如违期限，麦壹 驮倍(赔)两驮
S.5998 号：年 代不详悉宁宗 部落百姓贺胡 子预取刈价契	雇者：丝绵部落 某人 佣者：悉宁宗部 落百姓贺胡子	理由：佣者为负 〔官债〕 期限：限至秋七 月	雇价：刈价贰拾 亩，具体不详 一次性支付	佣者按期刈完，并获得相应报 酬	如若不刈，还麦
S.5998 号：背 年不详悉宁宗 部落百姓王晟 子预取刈价契	雇者：不详 佣者：悉宁宗部 落百姓王晟子	理由：佣者为负 〔官债〕 期限：限至秋七 月	雇价：刈叁拾 亩，麦陆硕并汉 斗 一次性支付	佣者按期刈完，并获得相应报 酬	如若不刈，还麦 陆硕并汉斗
P.1098：雇工送 粮契	雇者：李玉赉 佣者：悉董萨部 落武恩子	理由：〔当值〕运 输年度贡赋差 役，因李玉赉不 在，雇人来〔替 他执行差役〕 期限：直至运输 完毕	雇价：大麦、粟， 〔总共〕价值粮 食十四驮，另有 一卷棉布 分两次支付	1. 恩子无法完成玉赉的官差，或 年度贡赋份量不足，导致上司惩 罚，恩子本人负责 2. 如恩子没有完成〔运输差〕役， 拒绝执行，不在屋内〔逃亡〕，或 〔无法偿还〕，其保人负全部责任 3. 获得报酬	一〔方〕违反，须 立刻赔偿另一方 大麦七驮
P.1162 雇工契	雇者：苏君君 佣者：科兴	理由：因为君君 不愿从事劳役 期限：三个月 〔劳役〕运输	雇价：缺 分月支付	1. 报酬、劳役天数〔应该〕双方 同意 2. 雇价按约定按时支付	无
P.1297/4 雇工 收麦契	雇者：比丘张海 净 佣者：悉董萨部 落史皮皮	理由：佣者〔收 割〕十垅麦田 期限：秋七月收 割	雇价：缺	按时收割	1. 如违反，立即支 付僧人十垅地收 获的相同数量的 粮食 2. 如皮史被征官 差并外出，仍按 上述赔偿
Hedin3 雇工契	雇者：质逻李萨 宗 佣者：卓那墨多	理由：轮值军事 差役 期限：直至差役 返回	雇价：六汉硕重 的一桶美酒 返回时立即支 付	雇价须按时支付	如萨宗试图〔不 支付〕，保人帕萨 索达将双倍赔偿

续表 3:

文书名称	雇者与佣者	理由与期限	雇价与支付	权力与义务	违约与赔偿
Or8212/194a 雇 工契	雇者: 汨尚参 佣者: 王佛奴	理由: 合作开 垦, 劳动分工	雇价: 收获粟与 所有粮食, 平均 分配	1. 汨尚参提供三块山脊地, [总 面积]一突 2. 王佛奴提供耕牛和农具 3. 佛奴从事农耕时, 若有人[声 称]是[土地]的实际主人, 尚参 将[对此]负责	无
SI P/135 雇 奴 契	雇者: 扎噶荣帕 佣者: 质逻百姓 李阿色	理由: 雇奴 期限: 一年, 从鼠 年秋闰月十六日 到牛年秋九月	雇价: 支付所需 粮食及其任何 差役、军差或零 星差税	佣者为奴一年, 雇者保证雇价 支付	无

关于李玉贲族属,王尧先生在释文中提到为“于阗部落玉来”^①,武内氏认为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一名汉族居民;因为,在一件古藏文买卖契中直接标明了玉贲的族属为悉董萨^②(stong-sar)(即820年建立的汉人部落),而且,吐蕃统治时期也没有“于阗部落”这一称呼^③。苏君君虽未标明族属,但从姓名来看,应该也是一名汉族居民。如表所见,他们都需要承担运输劳役。P.1098号文书中提到运输的具体内容是“年度贡赋”,由P.1288吐蕃《大事记年》中提到的“征收农田贡赋”、“征集大藏之王田全部土地贡赋”^④等,可知这里的“年度贡赋”是吐蕃统治者向所辖地区征收的一种土地赋税。运输劳役通常是从秋收之后的八、九月开始,周期有时很长(P.1162中提到三个月),可能会持续到年底。这对刚经历过秋收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一项沉重的劳役负担。但是,正如表中所见,若出现服役之人“不在”或“不愿从事”的情况,是可以出钱雇人代役的。

上节提到Hedin3与SI P/135号文书都书写于吐蕃统治于阗时期,而且由契约中出现的于阗地名“质逻”与于阗“卍”字符推断,李萨宗与扎噶荣帕都是吐蕃统治时期的于阗居民。表中提到李萨宗原本负责“轮值军事差役”,但出于某种原因雇人代为服役。在吐蕃统治地区,雇人代服军役的现象一直存在。在新疆出土的一件吐蕃统治时期的军事简牍中记载到“派倭措巴部落之倭茹期策布去当斥候,由于有病,不能前往,需延期,与东部落之聂秀悉诺达对换,轮到当值时,由期策布前去”^⑤;在另一件于阗地区出土的文书中也提到“接替的士兵已来此,没有派出,他的债务人(代理人)是一位来自部落的人”^⑥。SI P/135扎噶荣帕的雇佣较为特殊,他是雇人为奴一年。实际上,在吐蕃统治地区个人性质的雇佣也比较普遍。如:在一件古藏文书信残卷中提到“于阗佣人”^⑦;在一件复小罗布军帐大尚论书中也提到一名叫洛俄塞的人从上阿骨赞部落曲扎西处“雇了一个名为普扎的仆人”,一直在俄塞处“帮佣”^⑧。

① 王尧著,拉巴平措编:《王尧藏学文集》卷4《敦煌吐蕃文书译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② 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141页。

③ 据杨铭研究,驻屯于阗的吐蕃部落有:章村部落、畿堆部落、叶若布部落、达布部落、聂巴部落、洛札部落、辗克尔部落、郎迷部落、帕噶尔部落、象部落、芒噶部落、赤邦木部落、娘若部落、赤塘部落、岗星木部落、计藏部落、雅藏部落;见氏著《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第71-73页。

④ 王尧著,拉巴平措编:《王尧藏学文集》卷1《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193页、第203页。

⑤ 王尧著,拉巴平措编:《王尧藏学文集》卷3《吐蕃简牍综录》,第202页。

⑥ [英]F·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⑦ 藏文转写见武内绍人:《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东京东洋文库、伦敦英国图书馆,1997年,第25页;汉译可参见杨铭、贡保扎西、索南才让编译:《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⑧ 藏文转写见武内氏:《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第225页;汉译可参见F·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133页。

表中有 3 件来自寺院的雇佣契约,雇佣的范围不仅有农业(P.1297/4 比丘张海净雇人收割十垧麦田),还有手工业(北图咸字 59 号背僧慈灯雇博士造佛堂,S.6829 号背永康寺常住雇工造棹蒿贰拾扇)。据武内氏释义,张海净是永寿寺的一名比丘^①,是一名汉人。实际上,P.1297/4 是伯希和收藏的 P.1297 号藏文文书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还有 P.1297/1 从永寿寺便麦契、P.1297/3 永寿寺比丘张本查买马契、P.1297/5 从永寿寺和尚张灵处借马契、P.1297/6 从永寿寺便豆契^②。可以看出永寿寺(weng-shivu sivi)在吐蕃统治时期是一座经济活动相对频繁的寺院。寺中的比丘不仅拥有土地,需要雇人收割麦子,而且还拥有重要的军事和运输物资——马匹。

再者,由表可见,佣者的身份基本上是吐蕃统治时期西域地区的百姓。而且,佣者多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主动出卖人身劳力,如:P.2964 号背令狐善奴为粮用、S.6829 号背张和子为无种子、S.5998 号贺胡子为负官债、S.5998 号背王晟子为负官债等。此外,从 SIP/135 雇者扎噶荣帕需要负担佣者李阿色雇佣期间所需粮食及其任何差役、军差或零星差税来看,极有可能是李阿色(li ar-sel)为躲避差役或赋税而主动出卖人身劳役。但是,Or8212/194a 的雇佣性质与其他雇佣有着明显地区别,雇者汜尚参与佣者王佛奴(wang bur-vdo)之间属于共同合作性质,雇者汜尚参提供土地,佣者王佛奴则提供农具和劳力。

那么,佣者出卖人身劳力是否就受到雇者的严重剥夺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雇价,雇价能够反映出佣者出卖劳力与获得报酬的相对比值;二是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契约中享有的权力与需要履行的义务则体现雇、佣双方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与自由度;三是违约赔偿规定,违约与赔偿的规定也能够说明雇佣契约究竟是对单向还是对双向的条约。拟结合这三个方面,对吐蕃统治时期雇佣契约中所见的剥削量以及雇佣的性质进行具体的探讨。

表中有 6 件文书明确记录了雇佣价格。其中,有 2 件反映了雇工刈麦的价格,即 P.2964 号背令狐善奴刈壹拾亩获麦壹硕陆斗、S.5998 号背王晟子刈叁拾亩,麦陆硕并汉斗。这里的“硕”和“斗”都是汉制的量制单位,据高启安先生研究,在当时的敦煌地区“十斗为石(硕)为定制”,而且在吐蕃统治时期,“吐蕃的一升就相当于汉制的一斗”^③。在一件新疆出土的吐蕃统治时期西域某地区的粮食相关简牍中,记录了“一个月口粮为麦子六[蕃升],青稞四蕃升”^④,即一个月口粮合计粮食十蕃升。

令狐善奴刈壹拾亩获麦壹硕陆斗,折算即十六蕃升^⑤,相当于刈壹拾亩地可以获得一个半月多的口粮。王晟子刈叁拾亩获麦陆硕并汉斗,在汉斗后面虽然没有标明具体数额,不过陆硕折算即六十蕃升,平均刈壹拾亩可以获得二十蕃升,相当于二个月的口粮。王晟子获得的雇价相对比令狐善奴高一些。P.2964 号背文书中提到了“限至秋七月内”,S.5998 号背文书中也提到了“限至秋七月已前”,可见刈麦基本需要在秋七月内完成。而令狐善奴只需刈壹拾亩,王晟子需要刈叁拾亩,从劳动强度上来看会比令狐善奴大很多。当然,劳动强度大,获得的回报也很高,相当于刈一个月麦即可获得半年的口粮。

再来看看,替人服差役获得的报酬情况。表中也有 2 件记录了代人服役的雇价:即武恩子(vbu eng-tse)替李玉赉运输年度贡赋可获得大麦、粟[总共]价值粮食十四驮,另有一卷棉布;卓那墨多(zho-nal mor-ldots)代替李萨宗轮值军事差役可获得六汉硕重的一桶(dong)美酒。这里的“驮”也是敦煌地区使用的一种计量单位。高先生在《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中提到“敦煌当时的驮有大

① 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 302 页。

② 古藏文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 12 册,第 57 页;释文可参见武内氏著《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 210、161、207、227-228 页。

③ 高启安:《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敦煌学辑刊》1999 年第 1 期。

④ 王尧著,拉巴平措编《王尧藏学文集》卷 3《吐蕃简牍综录》,第 178 页。

⑤ 按 1 硕=10 斗,壹硕陆斗即 16 斗,又 1 蕃升=1 斗,故相当于 16 蕃升。

小、汉蕃之分,犹如敦煌有汉斗、蕃斗一样”^①;但杨际平先生则认为“情况并没有这么复杂”,吐蕃时期的“一驮又等于一石”,并认为“此‘斗’应为汉斗”^②。

武恩子替李玉赉运输年度贡赋,获得粮食十四驮,折算为十四石即 140 斗(蕃升),相当于 1 年 2 个月的口粮。而且,还有“一卷棉布”,王尧先生释为“绢一匹”。按唐耕耦先生研究,绢和布的价格是有差异的,绢又分为大生绢和小生绢,“大生绢一匹合小麦一石二斗二升”,小生绢一匹“折合粟一石八斗”;布也有多种价格,有布一匹准麦“二石五斗”、“四石”、“四石二斗”、“四石三斗七升弱”、“四石五斗”,且“布一尺一般折麦粟一斗”^③。如果释为棉布,又没有标明具体尺寸,释为绢又没有标明大小,所以暂时无法进行具体推断。不过,雇期若按三个月计算,单就获得的粮食数额来看,平均 1 个月可获得约 4.67 个月的口粮,雇价还是相当高的。

卓那墨多替李萨宗轮值军事差役获得六汉硕重的一桶美酒,这里的“硕(即石)”是表示重量的权衡单位。杨际平先生在《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提到,“石”作为权衡单位时,“1 石=120 斤”。六汉硕重折算即 720 斤,单从数额上看,这个雇价也是比较高的。

最后,从寺院雇工造佛堂和造栴蓼来看手工业领域雇佣的报酬情况。汜英振为僧慈灯造佛堂可获麦捌汉硕,张和子为寺院造栴蓼贰拾扇可获麦壹蕃驮。按上述研究,汜英振造佛堂获麦捌汉硕,折算即 80 蕃升,合 8 个月的口粮;张和子造栴蓼获麦壹蕃驮,折算为 10 蕃升,即 1 个月的口粮。由此可以看出,在手工业领域,不同工种之间的雇价差别很大。此外,对比农业、手工业以及雇人代役的雇佣价格,农业领域的雇价较低,手工业领域的雇价居中,而雇人代役的雇价则相对较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不同领域出卖劳役受到的剥削程度也不尽相同。

那么,吐蕃统治时期雇佣的性质究竟如何,可以结合雇佣契约对双方的权力、义务与违约、赔偿的规定做进一步分析。由表 3 分析可知,雇者的义务主要是在佣者完成劳动之后如期按规定的数额支付雇价,而佣者的义务主要是按时完成规定数额的工作。雇者与佣者的权力与义务是相对的。此外,雇人代役的契约对佣者的义务规定更为详细,如双方约定具体劳役天数(P.1162 雇工契)、若运役出现超期或分量不足的情况,相应地惩罚需要由佣者承担(P.1098 雇工送粮契)。可见,在雇人代役契中,佣者在获得较高额报酬的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表 3 中,有 8 件雇契附带有违约赔偿条款,并且规定了赔偿的具体数额。赔偿的数额有三类情况:一是等额赔偿,如 S.5998 号和 S.5998 号背文书规定“如若不刈,还麦”、P.1297/4 号文书规定“如违反,立即支付僧人十垆地收获的相同数量的粮食”;二是双倍赔偿,如 P.2964 号背文书规定“如依时吉报不来,或欠收刈不了,赔罚叁硕贰斗”、S.6829 号背文书规定“如违期限,麦壹驮倍(赔)两驮”、Hedin3 号文书规定“如萨宗试图[不支付],保人帕萨索达将双倍赔偿”;三是差额赔偿,如北图咸字 59 号背文书规定“如先悔者,罚麦三驮”(约为雇价的三分之一强)、P.1098 号文书规定“一[方]违反,须立刻赔偿另一方大麦七驮”(约为雇价的二分之一)。

而且,违约赔偿的规定也不总是对双方,还存在对单向的。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农业领域雇工契的违约赔偿规定基本是对佣者而言的,佣者如不依时完工必须对雇者进行赔偿,且往往是等额赔偿,有时会用家资抵偿。手工业领域雇工契有对佣者单方的赔偿规定,规定佣者必须在规定期限完工,否则双倍赔偿;也有对雇佣双方的赔偿规定,如有悔约,需付出相应的赔偿。雇人代役契约中有对雇佣双方的赔偿规定,一方违反,需立刻赔偿,但数额相对较少;也有对雇者单方的赔偿规定,雇者不支付雇价,将由保人双倍赔偿。

① 高启安:《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第 67 页。

② 杨际平:《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敦煌学辑刊》2000 年第 2 期。

③ 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第 422、426-429 页。

综上所述,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关系:一是佣者完全奴役型,即 SI P/135 雇奴契,被雇佣者人身依附性较强,属被奴役性质,但雇佣有一定期限。二是佣者相对被动型,主要是农业领域的雇工,雇者与佣者人身相对自由,依附性较弱,但佣者获得的报酬低,还需承担违约赔偿。三是雇、佣双方相对平等型,即手工业领域的雇工,双方地位相对平等,人身相对自由,依附性不强,佣者获得的报酬也不低。四是佣者相对主动型,主要是雇人代役的契约,雇佣双方人身自由,不存在依附性,佣者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违约赔偿是对双方,有时甚至是保护佣者的权益。五是雇、佣双方互利互惠型,即 Or8212/194a 雇工契,雇佣双方是出于自身需要的合作关系,获得的效益均分,契约保证双方的利益。

三、吐蕃与唐前期、归义军统治时期雇佣的比较

据统计,吐鲁番地区出土有 22 件^①唐前期王朝统治时期的,西域地区出土有 29 件^②归义军统治时期的,加上西域地区出土吐蕃统治时期的 11 件,唐、五代时期的雇佣契约共计有 64 件。通过对这三个时期雇佣契约的比较,不仅可以廓清唐、五代雇佣发展的时代脉络,而且可以了解吐蕃统治在承前启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来分析这三个时期,雇佣内容的发展与变化。据统计,三个时期的雇佣领域分布如下表:

表 4 不同时期雇佣领域分布表

	唐王朝统治时期	吐蕃统治时期	归义军统治时期
农业	0	5	26
手工业	0	2	0
雇人代役	19	3	0
其他	3	1	3

从上表可知,唐前期的王朝统治时期的雇佣主要是雇人代役。雇人代役又主要分布在两个领域,一是,军役领域的雇人上烽契,有 17 件^③;二是,运役领域的雇人送练契,有 2 件^④。此外,有雇人放马契 1 件,不明雇人契 2 件^⑤。经吐蕃统治,到归义军统治时期,雇佣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雇工主要出现在农业领域。当然,由于出土资料的限制,这一统计很不完全。但是,从唐初到唐末五代,雇佣从徭役转向农业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一方面,这与唐代的兵制变化有关,唐前期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唐玄宗开始实行国家的募兵制,私人的雇人代役,尤其是军役也就随之消失了。另一方面,唐代后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出现大土地私有化倾向,加上税制改革(租庸调到两税法)带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

①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1-10 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 年),可见 18 件,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 年),新见 4 件,共计 22 件。

②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可见 21 件(即肆,雇工契部分编号 9-13、15-20、22、24-29、31-32、34,第 55-75 页),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可补 8 件(即丙,雇佣类编号 8、11、16-17、22、30-32,第 254-295 页),共计 29 件。

③ 这 17 件,分别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4 册,第 147 页;第 5 册,第 57-62、84、111、142、164 页;第 7 册,第 270-273 页;第 9 册,第 226-227 页。《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 368、373 页。

④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6 册,第 182-183 页。

⑤ 分别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6 册,第 590 页;《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 63、327 页。

弛,都为农业领域的雇工发展提供了契机。西域在吐蕃统治时期,虽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从雇佣的内容上看,实际上并未完全的孤立发展,而是带有连续性的。而且,吐蕃统治时期寺院手工业雇工的出现,也反映出寺院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再来看看,雇契形式的发展与变化。笔者分别从这三个时期,各选取一件内容及形式较为完整的契约,进行对比分析。为便于考察,将这三件契约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表:

表 5 不同时期雇契形式对比分析表			
	唐西州高昌县武城乡 张玉埴雇人上烽契	P.1098 雇工送粮契	乙卯年正月一日 孟再定雇工契
时 间	〔*〕正月廿八日	〔*〕年秋八月十七日	乙卯年正月一日
雇 者	武城乡张玉埴	李玉赉	莫高乡百姓孟再定
佣 者	同乡人解知德	悉董萨部落武恩子	龙勒乡百姓盈德
雇佣理由	无	因李玉赉不在,雇人来〔替他执行差役〕	阙少人力
雇价与 支付方式	银钱八文 即日交相付	大麦、粟,〔总共〕价值粮食十四驮,一卷棉布分两次支付	每月断物捌斗,春衣汉衫,皮鞋一两
雇佣内容	〔上烽〕壹次拾伍日	运输年度贡赋差役	一年造作
权力与 义务规定	若烽上有逋留,官罪,壹仰解知德当	1.恩子无法完成玉赉的官差,或年度贡赋份量不足,导致上司惩罚,恩子本人负责 2.如恩子没有完成〔运输差〕役,拒绝执行,不在屋内(逃亡),或〔无法偿还〕,其保人负全部责任	1. 主人并付与盈德者,失却仰,盈德祇当。若到家内付与主人者,不忤盈德之事 2 若盈德抛敲。忙时抛却二日勒物二斗,闲时勒物一斗
违约赔偿 条款	有先悔者,一罚貳入不悔人	一〔方〕违反,须立刻赔偿另一方大麦七驮	如若先悔者,罚青麦两驮,充人不悔人
套 语	〔获〕指为记	立契见人	1 两共面对平章,更不许休悔 2 恐人无信,故勒私契,用为凭押字为验
签 字	雇主 受雇人 保人(1 名) 知见人(1 名) 指印	被雇方 保人(2 名) 见人(5 名) 印章	受雇者兄(押) 受雇者(押) 后缺

说 明:《唐永徽六年匡某雇人上烽契》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5 册,第 164-165 页。《乙卯年正月一日孟再定雇工契》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 67 页。

对比这三件文书,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共通之处:一者,都在契首标明立契时间;二者,都会标明雇者与佣者的居住地,有时还会标明具体的身份(乡人、百姓等);三者,雇契中明确了双方的具体权力与义务,尤其是对佣者的义务规定,即按时完工,否则需承当相应的责任,有时甚至会受到惩罚,而雇者的义务主要是按时支付约定的雇价。四者,通常会附带违约赔偿性条款,规定立契双方不得违反,否则会受到契约中约定的惩罚;五者,在契约末尾都有私契中常见的表明立契双方当场签订契约的套语;六者,在契约末尾的签字中,会以指印、私章、押等多种形式来增强契约的可信度,并在立契时有保人

- 76 -

和见人(知见人)。

当然,对比后还可以发现,在吐蕃统治时期雇契形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且这一变化被随后的归义军统治时期所继承:一是,雇契中出现雇佣理由的说明,如在吐蕃统治时期的 P.1098《雇工送粮契》中,说明李玉赉雇工的理由是因为自身“不在,雇人来[替他执行差役]”;而在归义军统治时期的《乙卯年正月一日孟再定雇工契》中,也说明了孟再定雇佣的理由是“阙少人力”^①。二是,雇价支付方式的变化,即从货币支付(银钱)转为实物支付(麦、粟、春衣、皮鞋等),这一方面,反映出西域在吐蕃至归义军统治时期,商品经济并不活跃,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动荡,相较于并不稳定的货币,人们更希望获得实物的报酬。三是,雇契末尾略去雇者的签字或印、押、私章,这表明雇契或由雇者保存,开始逐渐倾向于保证雇者的利益。

不过,吐蕃统治时期的雇契,也明显呈现出吐蕃统治的民族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在吐蕃统治后期,下令统一用古藏文书写契约。再者,吐蕃独特十二生肖纪年方式,也被运用到雇契当中。此外,雇契中还反映出,吐蕃在西域实行特有的“部落制”与采用吐蕃量制(驮、蕃斗)的情况。

通过三个时期的对比,可知从唐初到唐末、五代雇契形式发展具有连续性,且渐趋完整与固定化。从雇契的形式来看,吐蕃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一方面,延续了唐王朝统治时期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在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为后一个时期即归义军统治时期所延续。而且,从雇契中也可以看出吐蕃统治时期明显具有时代与民族特色。

[参 考 文 献]

- [1] 也小红. 中国中古契权关系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 侯文昌. 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 [3] 杨 铭. 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4] 唐耕耦. 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M].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 [5] 陈国灿. 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J]. 西域研究,2016,(4).
- [6] 陈国灿. 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J]. 敦煌学辑刊,1984,(1).
- [7] 高启安. 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J]. 敦煌学辑刊,1999,(1).
- [8] 杨际平. 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J]. 敦煌学辑刊,2000,(2).

^① 在同一时期的其余雇契中也有相类似的表述,如:《戊戌年令狐安定雇工契》载“为缘家内欠缺人力”,《辛酉年李济昌雇工契》载“伏缘家内阙乏人力”,《戊子年梁户汜三雇工契》载“家中久少人力”等,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55、57、60页。